

校史馆里刘宝慈的一件手迹

——匾额文史之四十七

吴裕成

清末兴学,基础教育转型,传统的塾师课徒式发蒙教读,在翻篇。新式学堂涌现之际,一所选西门里中营及三圣庵基址建起的小学,自有高光——名称标出“模范”二字。上世纪40年代《天津市模范小学校长碑记》载,直隶总督袁世凯“命设天津模范两等小学堂,俾各属兴办小学者有所取法”。直隶各地兴学渐次铺开,需要打造范式、立个标杆,这便是历史名校中营小学的起步。

提及这所小学的校史,总要讲到建校校长刘宝慈。校舍的建设,课堂向阳,礼堂矗后,设理化室、手工室、游戏室,辟运动场,有“环廊绕室,能障雨雪”,这番“布置皆出先生之意”。有关理化手工、游戏体育的选项,为传统学塾家馆所欠缺,是体现那个时代新教育理念的课程设置。

如今,中营校园里还保留着一片老校舍,成为城区改造后寻觅明清街巷、城市肌理的方位坐标。老校舍间,竹生亭为后来增建。这是纪念亭,亭内立着刘宝慈雕像,亭匾由古文字学家王襄书写。刘宝慈字竹生,号

白云。雕像旁石碑的铭文,有言“先生于东廊一室颜曰‘演庐’,昕夕居焉”,记刘宝慈的办公室。文人传统取斋号。刘校长以“演庐”名斋,挂了匾额。

刘宝慈是出生在广东的天津人。其祖父为封川县令。刘宝慈跟随父亲刘宗晏的宦迹,成长于浙江。后来,堂兄弟刘蓉生、刘宝和(又名潜,字芸生)随刘宗晏来到杭州。五年间,刘氏三兄弟同窗攻读,“座下置瓮,日课诗业进退”,时有“刘氏三杰”之誉。1892年(清光绪十八年)春,刘宝慈、刘宝和原籍考学,回到天津北门西城根刘宅。哥俩携手入泮成秀才。三年后,刘宝慈乡试中举。1903年,教育家严修选取天津十人首批留日学师范,宝慈、宝和兄弟同舟东渡。这哥俩,刘宝和曾受严修委派筹建天津私立第一小学堂,并任监督兼总教习;刘宝慈规划筹建模范小学堂,长校36年。

36年里,刘宝慈谢绝升迁,以校为家。他以先进的教育理念,将嵌在校名中“模

范”二字擦得闪光熠熠,不管是冠以“直隶”“河北省”,还是“天津特别市”。四字校训“勤朴敏健”,他的治校总则,成为名校底蕴的一张名片。他上讲台,为各年级考试出题,为高年级学生批改作文。他礼遇教员,关爱学童,每日在校门口迎送学生,风雨无阻。对此,居家邻近学校的林墨青称道啧啧。这是一位教育家对另一位教育家的称赞。林、刘二人传记,同被收入天津市政协文史委所编《近代天津十二大教育家》一书。

在中营小学校史馆,显著位置展出刘宝慈校长诗作手迹照片,《来诗谦逊,愧不敢当,依韵和一首》:“神州风雨覆巢时,沧海横流忍别离。当有惊人辛苦技,穿杨谁学养由基。演庐一五·一〇·二七。”诗写于1926年,是写给1925届毕业生卞慧新的。其时,刘宝慈53岁,卞慧新14岁。

相关诗话,涉及他们师生二人,还有著名教育家严修。

毕业一年后,少年卞慧新以《怀刘竺笙夫子》诗感念师恩:“杏坛忝附忆儿时,咫尺程门帐隔离。立雪年年增寸尽,不忘道积笔丕基。”四句诗,用了杏坛授业、程门立雪两个尊师典故,分别关乎

教、关乎学。值得一提的是,卞慧新此诗附注:“丙寅年(1926)九月十八日作,严范孙先生批改诗稿。”收到刘宝慈依韵和诗,卞慧新又写道:“程门立雪忆儿时,咫尺域闾帐隔离。勾践未闻能霸越,十年教训是吾师。”这三首诗,均编入卞慧新文集(尚在校印)。

1992年,八旬之际,卞慧新自选所作,编目复印,装订成册,题名《愿学斋杂文偶集》。特将刘宝慈校长那首和诗手迹排在卷首,“以永教泽”。

卞慧新,天津市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、市文史馆馆员。近百岁时,文史馆筹划为其编文集,卞先生自序仅十字:“性不因人热,情能到处流。”前一句,化用刘宝慈校长之句。1929年,刘宝慈以诗挽教育家严修:“热不因人吾太僻,风尘过眼感君青。”刘校长曾对卞慧新讲解这两句诗表达的意思:“我生性耿直,难以处世,严先生知我,倚任不疑。我心怀敬敬,故挽诗作此语。”

何谓没齿难忘?卞慧新一句“性不因人热”,老师的教诲与影响,师生情深,已然跨越时光。模范小学的模范校长,刘宝慈的人格魅力,上述诗话,也是展现。

张霁题画

吴蓬莱

张霁是天津清代诗歌代表作家之一。他习书法,曾为寺庙写匾。也喜绘事,有诗《自题画虾》:“微躯逐鱼游,忘却长须国。香饵从不贪,江湖任尔跃。”诗用长须国故事,有位读书人航海漂至长须国,被恳请去水晶宫做说客,抱怨龙宫食虾太多。虾须长,生出这故事。又有《戏题画虾蟹》:“莫待须如戟,休矜爪似锥,蓼花滩水静,正是捕鱼时。”蓼花多生于水边湿地,秋季开花,正值蟹肥时节。

屏上画水仙,张霁诗:“几笔亭亭立,幽姿不是

兰。佳人倚翠袖,湘女著黄冠。仿佛香堪挹,分明色可餐。隔屏迟入梦,应有珮珊珊。”只读这诗,已有生花妙笔之感。画幅老树,当有寄意:“老树含青不忍攀,东风常觉意闲闲。枯枝莫讶春难到,近映溪光远映山。”人未老,心态更未老,诗人张霁以此表达对于人生的自信。

涉笔山水,张霁《戏题自作山水与某道士》:“不知可似碧芙蓉,送与先生辨笔踪。闻道松窗湿地,秋季开花,正值蟹肥时节。”赠以画作,说声见笑,题画四句诗,风趣盈画纸。

新大路往昔

曲振明

新大路位于河北区中部,北起中山路,南至小树林大街。早年这一带为荒地,后被辟出一羊肠小路。1903年开辟河北新区,按照《千字文》中的“律吕调阳”排列,命名“阳纬路”。

该路早年为石灰路,1928年8月大雨连绵,路头至中间,长约二里许,一片汪洋,水深一尺有余。沿街商铺,无不被水浸泡。又因连日积水不下,商民颇感不便。1933年,红十字协会在新大路建救治伤兵的第一临时医院时,发现道路坑洼不平,后经工务局派员垫平。1934年,天津

举办华北运动会,新大路作为必经之路,又被重新修整。

1936年,市政当局因东站与北站之间通过万国桥与金汤桥衔接,经过租界,多有不便,遂计划在两站之间开辟一条道路,即由新大路北口经陈家沟、郭庄子直通东站,由此将新大路辟为干道。经勘察发现,尽管该路规模粗具,但路面坎坷不平,要翻修成沥青路面。后因资金紧缺,时局不稳,计划没有落实。1940年,新大路翻修成大碴石基碴石路。新中国成立后,新大路建成柏油马路。

与李叔同同门

章用秀

华靖,清末民初人,字文宰。天津人。善写篆隶,笔意潇洒飘逸,自成一家。华靖的书法家承津门书印名家唐育星。

唐精于岐黄之术,后以行医为业,诊金甚昂,有“唐八吊”之称。早年书学唐隶,后改习秦汉。其篆刻浑穆古雅,有秦汉风度,尤以转折处颇有《天发神讖碑》之意,辑有《颐寿堂印品》一卷。亦工山水画。

唐先生教授弟子书法,力主从北碑入手,取法秦汉六朝。华靖遵循先生教诲,故有大量临习金文、权量、诏版、《峰山

刻石》、汉碑之作,其书法极具唐师味道。

龚望先生在《李叔同金石书画师承略述》中言:“天津人曾从唐先生学书、篆刻者,仅知三人,一华靖字文宰,一王雨南,华之表亲,一李叔同。”可知华靖与李叔同均学书于唐育星,在书法上,华与李叔同当是同门弟子。

华靖家学渊源,其先世对书法之道颇有见地,这对他也有一定影响。他的高叔祖华琳(1791—1850)是一位具有多方面修养的艺术家。正如华靖说的那样:“精音律,善南北宫调,花木竹石之外,时以丝竹自娱。”华琳的名著《南宗诀秘》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。

敦信墓志铭纠错

金学钧

1987年,在蓟州城东儿童乐园建设工地发现了一座明代墓葬,并出土“明故磁州学正敦先生墓志铭”。该墓志铭纠正了《蓟州志》《磁州志》关于敦信记载中的错误。

“明故磁州学正敦先生墓志铭”记载了墓主人敦信生平事迹和世系情况。敦信生于明永乐十八年(1420),正统十年(1445)中举人,景泰四年(1453)出任山西绛州(今山西新绛)学正。学正是封建社会负责科举制度的官吏,掌管地方科举考试,一般都由朝廷委派。明天顺二年(1458),因其父敦谦病逝,回

顺天府蓟州家中守孝。明成化二年(1466),出任磁州(今河北省磁县)学正。敦信卒于明弘治八年(1495),终年75岁。

墓志铭里边提到的敦信父亲敦谦,明永乐年间任山东临清学正,在清《蓟州志》中误写成了“郭谦”。而《磁州志》也将敦信的籍贯写成“苏州人”,因繁体字中“蘇”与“蓟”两个字体接近因而造成了混淆。

2004年,在敦信墓附近发现了敦典夫妇的合墓葬。敦典系敦信之子。墓志铭记载,敦典生于明成化二年(1466),卒于明嘉靖二十一年(1542),终年76岁。敦典聪颖过人,却屡试不第。

也在重庆,他常来沙坪坝看一个好友的弟弟陆智常,顺道看望杨苡。杨苡回忆说:“在外面逛,或是坐茶馆,我们都是三人一道。三个人站在嘉陵江边,看日落,看江景,聊各种话题,从自然风光说到南方人北方人,随意地聊。”杨苡意味深长地说:“我和赵瑞蕻之间是没有这样的聊天的。”

穆旦离开重庆时,和杨苡作了最后一次倾心长谈。那次陆智常找个借口回避了:“那也是我和穆旦为数不多的单独在一起说话。”两人聊了很久,杨苡还把自己的诗

●老城厢旧影 广元胡同

张 建文并撰

位于老城厢,北起尹家大院,南至小马路,北端东侧与欧家胡同相通,中与黎明巷相通。长约130米,宽3米左右。大约1939年逐步形成胡同,曾称尹家胡同,1984年在地名普查时因重名,便借用四川广元市地名更此名。两



侧均为低矮的平房。照片摄于2003年5月。

好友穆旦

魏邦良

联大同学都知道杨苡情有独钟,苦等李尧林,赵瑞蕻“乘虚而入”的“纠缠”非绅士所为。穆旦原本是赵瑞蕻好友,为此和赵瑞蕻绝交了,还说了一番气话,说他穆旦如果想追杨苡,一定追得到,但他不追,因为不应该。

杨苡婚后,穆旦和赵瑞蕻又和好了。有段时间,杨苡在重庆沙坪坝工作,穆旦

给穆旦看,请他提意见,穆旦指出一些毛病,看到杨苡脸上悲观的表情,穆旦指出毛病的同时也说了一些鼓励的话。杨苡回忆道:“那天是穆旦的生日,也聊个人生活上的问题,都有很多苦闷,就互相说。说到最后,发现两人之间有那么多共同语言。那个时候,什么都说不准的,分手了,何时再能见面,谁也说不准,也许就再也见不着了。而且我已结婚有了孩子,我们之间是不可能的,连这些话都说开了。说开了倒也轻松,当然也有点难过,穆旦说,就

当今天晚上是个梦吧。”

最后,两人拥抱了一下,算作告别。

穆旦还在信中说他和杨苡之间的关系是:“More than friendship, less than love (译为:比友谊多,比爱情少)”。杨苡说:“我也是这么觉得,他说得很对。”

杨苡与穆旦的交往可谓“发乎情,止乎礼”;也可用“天空没有翅膀痕迹,但鸟儿已飞过”来形容。

津 沽 文 丛

杨苡的爱情与婚姻之三

